中国速记百年史

绪　　言

1990年 8月在锦州举行的庆祝第二届中国速记节学术交流会上，速记界的“五老”（居正修、唐亚伟、颜廷超、刘拓、陈荣滨）倡议编写出版《中国速记百年史》，以便彰往昭来，后继有人。1993 年 7 月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史志专业委员会，负责组织、编写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国各地速友的关心、支持、参与、赞助下，这本百年史得以问世，以纪念中国速记诞生一百周年。

一、意义与作用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

从保存遗产来说，我国速记从 1896 年以来，迄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出现过近 300 种速记方案，也办过许多速记学校，不但为社会培养一批专业速记员，为时代作记录，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也出版过一批速记书刊，向社会普及速记知识，使速记成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从中外交流来看，我国速记从产生到发展，是吸取了各国的成果。英国的皮特曼、史龙速记，美国的凌士礼、葛锐格速记，日本的田锁纪纲、熊崎健速记，苏联的国家统一式速记，对我国速记的创案与研究，都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与开放的扩大，中国速记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研究与编写中国速记百年史，有助于参加国际速记打字联合会的学术活动，有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于正确对待中外速记文化交流，有助于正确处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与研究成果。

从培养人才来看，速记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科学。彰往昭来，推陈出新。速记技术要发展，离不开前辈速记员速记实务的经验的总结与技术的传授；速记科学要创新，也少不了前辈速记学者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继往才能开来，知旧才能创新，后来才能居上。

从民族文化来看，速记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速记，是在极其艰难条件下进行速记创案、速记研究、速记教学、速记应用的。前辈学者蔡锡勇、沈学、张才、汪怡、张邦永、杨炳勋、唐亚伟、范资深、金长风、郭立华、刘捷声、陶沙、颜廷超、王正、黎宏基、徐培汀、张长松、陈荣滨、刘拓等人，为创制速记方案，奠定速记理论基础，贡献了青春与才华。蔡璋、赵雅庭、张霁中、宋桧华、赵政、赵邦典、陈新、阎德勤、赵利坛、郭大新、萧绪元、金芳、张洪声、朱宗城、蒋朝参、宋斌、鲍恩贵、范立荣、郭枫、廖人群、徐国亮、庞麟、邓纲、柳守仁等人，为普及速记教育，培育速记人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白陈群、罗常培、黄昌谷、林春华、许师慎、居正修、袁永竹、沈安娜、廉正保、高铮、葛继圣、周志中、韩珠璇、刘坤儒、赵明月、钱锋、徐宏发、鲁晶华等人为时代作记录，为历史作见证，为速记的应用作出贡献，使速记这门新技术得以享誉社会。

二、内容与范围

速记≠音标；

速记≠文字。

我国速记，按书写方式分，有手写速记、机械速记、电脑速记。

手写速记，从符号体系分，有字母速记与线条速记。线条速

记，又可分草书（斜体）速记、几何（正圆、椭圆、叶子）速记、综合速记。从音符配制来看，汉语语音结构有三个层次，底层是音素、中层是声韵、表层是音节，因此又可分为音素化速记、声韵化速记（我国汉语速记方案绝大部分是三拼音或双拼音声韵化速记）、音节化速记（俗称“一线一音式速记”）。

速记符号体系虽然不同，但目的与方法是一致的。就是使用特定的符号与特定的简略法则快速而完整地记录语言。是一种快速记录的特殊工具，与通用文字不同。

我国古代的‘章草’、‘今草’,是汉字的‘快速书写法’,有人称之为“古代速记”，这是不对的，草书≠速记。1909 年的刘世恩的《音韵记号》是一种类似注音字母的拼音文字方案，并非速记方式；1913 年胡雨人的《简字》和平生的《简易速记法》，是汉字的快写法，也不是速记，故不在速记百年史的范围。

中国速记百年史，纵向按时间先后，分时期阐述中国速记的历史演进；横向分述速记创案、速记应用、速记教学、速记研究、速记团体、速记学者、著名速记员与速记教师、速记的中外交往、速记界大事记等等。

三、起点与分期

本书以 1896 年为中国速记百年史的起点，以蔡锡勇、沈学为中国速记创始人。

有人认为，沈学的速记方案正式发表要比蔡锡勇早。“沈学的速记方案发表于 1896 年 8 月以前，而蔡锡勇的速记方案发表于稍晚的 1896 年 9 月（丙申孟秋）以后。从来对于著作权和发明权的判定，都是以正式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准，绝不是以研究开始的时间长短来判定的。所以，如果沈、蔡要为中国速记发明权打官司，无论从‘法’的立场或‘例’的角度，只能判定沈学胜诉。还可以附加几条‘旁证’：其一，沈学的《盛世元音》还不

是他正式发表的原文和全文，只是其英文原版《天下公字》的理论部分的汉译本。虽然迄今未能找到《天下公字》的原著，但也足以说明沈氏正式发表自己的速记学术著述，当更在 1896 年 8 月以前。其二，沈氏速记向社会公开宣传和推广，至少是 1895 年以前。其时沈氏已接受了‘教师卜监院之请’在公开‘演讲新字’了，当时还有外国的速记行家雪司培在座听讲。其三，在《盛世元音》发表之前，沈氏早已‘在上海一林春茶楼挟技以待来者而授焉’，公开在群众中进行传授。其四，也是在此之前，沈氏早已挟其技而向蔡（锡勇）、卢（戇章）、吴（锡山）、雪司培等人中的最优者雪氏挑战了，要求进行速记比赛，而来自西方‘正宗’的速记行家则不敢应战，‘敬谢不敏’。反观蔡氏速记，当时除了‘以授儿辈’用作家人间‘传信往来’以外，并未向社会公开宣传、推广。”（华新：《评中国大百科全书〈速记〉条——就教于张潮老师》）

的确，从 1896 年 9 月梁启超为《盛世元音》所作序中说沈学“年十九而著书，五年而书成”来看，沈学的《天下公字》英文原本完成于 1895 年，确实比《传音快字》正式出版要早一年；但梁启超的序言也提到“去岁（按：指 1895 年，从《万国公报》中，获见厦门卢戇章所自述，凡数千言；又从达县吴君铁樵，见蔡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韵，一母一韵，相属成字，声分方向，画别粗细，盖西国报馆，用以记听议院之言者，即此物也。”好像蔡锡勇（字毅若）的《传音快字》有两个版本。梁启超已于 1895 年从友人吴铁樵处已看到过《传音快字》 46 声、26 韵的版本（可能是手写本）了； 1896 年蔡锡勇正式发表的《传音快字》的版本则是 24 声、32 韵，两者是不同的。沈学的《盛世元音》中也提到“今复有龙溪蔡某制直行快字”一句，证实《传音快字》有两个版本；沈学著《盛世元音》前，似乎也曾见过似的。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就很难说沈学的《天下公字》早

于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了。

蔡氏著《传音快字》准备了十余年，大约在 1895 年已完成，把手写本送给友人吴铁樵征求意见；沈学“年十九而著书，五年而书成”,也于 1895 年完成英文本《天下公字》（可能也是手写本，因为沈学当时还是个穷学生，所著的《盛世元音》也只能向报刊投稿，无力自费印行），而蔡、沈两书正式发表的都在 1896 年，故沈学与蔡锡勇同是中国速记的创始人。但速记得以应用和推广是蔡氏父子（蔡锡勇和蔡璋）的功绩，所以称蔡锡勇是中国速记之父，这是无可非议的。

中国速记百年史的分期，按速记实际情况可分为 6 个时期：

（一）启蒙期（1896 ~ 1911），从维新运动开始到辛亥革命止。我国最早的速记方案，是蔡锡勇作为救亡图存、广开民智的汉字改革方案而提出来的。他的儿子蔡璋把《传音快字》用于资政院会议记录，使快字成为速记，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二）初创期（1912 ~ 1937），从民国成立到抗战爆发。在议会和会议记录方面，蔡璋式与张才式都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记录；在速记教学与推广方面，由蔡式一统天下到汪怡、张才、张邦永、杨炳勋“四马齐驱”；速记教育由官办变为民办；使叶子、椭圆体系速记方式初露头角。

（三）推广期（1938 ~ 1949.9）从因抗日战争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霁中把汪怡速记（第四式）带到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一大批党的速记员。亚伟速记在重庆诞生，一枝独秀；使国人广知速记，自亚伟始。范资深、郭立华、金长风等人，为速记的研究与推广展示才华，贡献社会。

（四）发展期（1949.10 ~ 1955）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 1955 年。建国初期，出现速记应用高潮，北京、上海、武汉、哈尔滨各地速记教育发展迅速。 1952 年，《苏联国家统一式速记及其理论基础》传入我国后，研究与创制中国斜体速记空前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跃。1958年开办的北京速记学校，这是继清末资政院速记学堂后的第二所国家直接管理的速记专业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速记人才。

（五）低潮期（1956～1978）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运动不断，私立速记学校相继停办，特别是“文革”十年，连政府办的北京速记学校也被迫停办。速记书刊被销毁，速记应用停滞，速记教学人员被迫改行，许多有志速记的青年，求学无门，我国速记教学与研究临近灭绝的边缘。

（六）革新期（1979～199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速记带来了春天，进入速记复兴时期，速记教育普及，速记学会、研究所相继成立，速记书刊出版，速记方式革新，电脑速记开发，中外速记交流，国际活动增多，我国速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我国古代是否已有速记？

有人说，我国唐代已有速记，不但能记录汉语，而且还能记阿拉伯语；也有人说，汉代的草书，就是我国最早的速记。这些说法，意在弘扬中华文化，但是否科学？

先说草书。

草书是汉字的草体快速手写方法。作为一种字体的演变在古代中国，起过快速书写的作用，但它本身并不是速记。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字，都有正书、草书之分。因为文字是全民通用的书面语言，而速记则不然，只是部分人快速记录的工具。所以草书是文字的草书，速记是语言的速记，速记≠文字。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了解决汉字书写缓慢的缺点，快速书写的一些方法便应运而生。

我国汉字从有实物可考证的甲骨文算起，经历金文（周代钟鼎文）、大篆（春秋战国文字）、小篆（秦代文字），在不断地向

简化方向改进，从隶书、楷书到草书、行书、简化汉字几个阶段来看，是由繁到简，由难到易，反映我国人民为了快速书写而进行着不懈地努力。

“汉兴有草书”(《说文·序》)，说明“草书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唐庾省吾语）。东汉章帝时，史游作“章草”(各个独立),张芝作“今草”(前后相连),使书写汉字速度达到分速90字，反映了我国先民简化汉字和提高书写速度的强烈愿望。草书虽不是速记符号，却是快写的文字。它起过迅速记录的作用，是汉字体系中的“快速书写法”。“草书”后来愈写愈草，难以辨认，现在，人们已很少使用，只是作为一种书写艺术保存下来。

再说唐代速记是否存在？

唐朝末年，“丝绸之路”畅通。传说我国有位学者在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住了一年多，学会阿拉伯语。在这期间，他和一位阿拉伯医师（炼丹士）拉齐结为好友。公元650年，他奉命回国，想把阿拉伯的一部经典传回祖国。在回国前一个月的一天，他请拉齐给他念盖伦的著作他记录。无论念多快，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使拉齐惊叹不已，但拉齐给念的盖伦的著作，一定是用阿拉伯语记录，当然不是汉字。这个快速书写的故事，被巴格达人纳丁记入《科学书目》，后却又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录进他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这个故事如果是真实的话，的确很能说明我国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古代中国人已能创造一种速记法，可以快速记录阿拉伯语，可算是“世界第一”；可惜由于学习困难（据说需要20年），后继乏人而失传了。

速记≠音标。速记都是按本民族语言特点而配置音符的，所以英语速记不能记录法语或德语，因此粤语速记也不能记普通话，当然普通话速记也无法记录粤语；美国葛锐格速记也不能用

来记录汉语。同样中文亚伟速记，也无法记录美国英语，因为语言不同，速记符号也难通用。唐代中国能否发明一种可记外国语言的中文速记，按常理来说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可能是一种“音标符号”用来记录阿拉伯语。晚清学者沈学，当代学者李思元，都曾设想用一种速记符号来记录世界各国语言，他们误把速符当音标用。“设想”虽好，可惜无法变成现实；更不可能在 1300 多年前的唐代实现拼音速记法。

（二）怎样看待外国速记对中文速记的影响？

科学家有祖国，但科学技术本身却无国界。在古代，我国的四大发明传向西方；在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速记术传向中华。

早在 3000 年前的古代埃及，就有人感到象形文字书写不能适应语言的发言速率，便创造出一种用简单的线条符号来追踪语音的快速书写法——速记。每样东西或每个概念，都用一个特殊的符号来表示。

公元前 10 世纪，腓尼基人为了向海外殖民和贸易的需要，曾创造一种速记。这种速记有 25 个字母符号，刻在黏土制成的小牌上，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拼音速记。

公元前 350 年，古代希腊人也曾创造出一种速记方式，用于记录演讲。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是用这种速符记录他的老师、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回忆录的。

卑贱者最聪明。古罗马拉丁语速记是由一个名叫马尔卡斯·大利乌斯·泰罗（Mareus Tullius Tiro 公元前 103～40）（奴隶）于公元前 82 年创造的。泰罗后被解放为自由民，由著名雄辩家西塞罗收为门徒，用作秘书。记录他的讲演，得以传流后世。

公元前 83～76 年间，苏拉执政，实行军事独裁，因政见不同，西塞罗逃亡雅典、小亚细亚一带，他的许多演说均是他的门徒泰罗速记下来的。

公元前 63 年，西塞罗当选为罗马执政官，与卡提兰展开争权斗争，卡提兰企图发动政变；西塞罗采取紧急措施，逮捕在罗马境内的卡提兰分子，由元老院指定法官审判。

公元前 63 年 12月 5 日，大法官康顿指控和判决卡提兰阴谋叛变的言辞，是由泰罗的门徒用速记符号在腊板上记录下来的，这是泰罗速记在法庭公开使用的例证。

泰罗速记的符号是从草体拉丁字母中分割出来，是一种草书体系速记。它不但在古罗马流传很广，而且使用时间甚长，以后在动乱中长期湮没。

1588 年，英国学者提摩太·布赖特（Timothy Bride 1550～1615）到罗马考古，发现泰罗符号，以之改编成正圆体系的英语速记，写成《符号学》一书，献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给他这本著作 15 年专利权，使长期湮没了的速记又复兴起来。

继英国以后，法国在 1651 年、德国在 1796 年、美国在 1844 年、俄国在 1858 年、日本在 1882 年，中国在 1896 年，相继创造出本民族语言的速记。在 19 世纪，形成近代三大代表性的速记方式，即 1834 年草书斜体体系的德国戈贝尔斯伯尔速记、 1837 年正圆体系的英国皮特曼速记、 1888 年流线椭圆体系的美国葛锐格速记。后来德国草书式斜体速记被欧洲大陆各国采用，又传入俄国，1919 年以索柯洛夫速记为基础在 1933 年形成的苏联国家统一式速记也是一种草书斜体式速记方式。这些体系速记方式对我国速记都有过影响。

我国早期的正圆体系速记方式如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是受美国凌士礼英语速记的影响；张才速记与邦永速记，都受英国皮得曼速记的影响。

我国流线椭圆体系速记方式如（张）兆云速记、（唐）亚伟速记，是受美国葛锐格速记的影响。我国草书式斜体体系速记方式，如颜廷超的《人民新速记》、唐亚伟的《工农化速记》、速记

月报社创研组的《斜体式中国速记》等都是受苏联国家统一式速记的影响。

（三）怎样看待汉语速记的民族形式？

长期以来，速记界有个困惑难解的问题，在西方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速记应用普遍、广泛；我国使用方块汉字，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书写缓慢，按理说速记更有用武之地。但实际情况速记却应用不多，推广困难，学习也不容易，其中固有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不容否认的，也有个速记与汉语、汉字的关系、速记的民族形式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速记是一门快速记录言语、转抄文字、表述思想的实用技术。索柯洛夫著的《苏联国家统一速记学的理论基础》一再指出，一种合理的速记方式，必须“采用普通书法的笔画”，“适合普通文字的书写习惯”；“照顾到普通文字的特点。”

中国速记的发展，必然地要走向民族形式的道路。1953 年《速记月报》为此开展了关于速记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唐亚伟指出：“由于中国文字体系与苏联不同，因而便产生了民族形式的争论问题。我们应该深入研讨，研究民族形式指的是什么？是符号的形状呢，还是语言的结构？”

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与看法。

一种意见是认为速记的民族形式即是速记方案符形的民族化，因而主张采用汉字中合理的笔画作为新方案的符形基础。“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文字系统。中国速记方法，必须与汉字的书写习惯密切结合起来，使速记符号的书写方法与汉字的书写方法趋于一致。”（阳春暄、赵匡仁：《中国速记的民族形式问题》）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速记的民族形式主要是指速记方式是否合乎本民族语言的结构与特性。“我认为民族形式应当指语言结构而不是符号形状。但必须指出，采用外国符号也不是完全照套的，是应该加以研究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考虑的。”（李中平：

《我对于速记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速记无所谓‘民族形式’不‘民族形式’，只要达到‘易学’、‘易写’、‘易译’就行了。因为速记研究是一种技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它。”（冯克勤：《我对速记民族形式的意见》）“讨论中国速记的民族形式问题目的何在呢？那就是为了要创制一个易学、易写、易译的，能够迅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速记方式出来。”（何蔚：《试论中国速记的民族形式》）“一个民族形式的速记方案，它与本民族语言的关系是最紧密的，所以对民族形式的速记方案的要求是：整个的符形配置、拼音规律，必须是为本民族最熟悉的。一个书写工具的应用，光靠基本符号是不能满足迅速书写的要求的，所以也必然产生一些规定的略法。这种略法的规定，必须与本民族的语言特性相结合，任何搬套外国速记的略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语言的特性。”（陆士龙：《我对中国速记民族形式的认识》）“照我们看来，所谓符合汉字的特性和结合汉字的书写方法这两项原则是应该分别来看待的。前者是绝对的、不可移易的；违背语言特性的速记法绝不能视为民族形式的速记方式。后者则只要求速记的笔画合乎日常的书写习惯，以便于学习和达到实用的目的，是不能看作绝对的条件的”，“写法毕竟只是写法，它不能够改变一种速记法的根本性质；而一种速记法的根本性质，是应该从速记法是否合乎语言特性来考虑的。”（《速记月报》编委会：《讨论速记民族形式问题小结》，见《速记月报》 1953 年 10 月号）

总之，汉语速记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即使同一方式对各声、韵符的标音也不同，但都必须遵循同一法则，就是必须与汉语实际相结合。只有在速记方案中能使汉语的语音、音素、语法、造句、结构等的设计与汉语的特殊性相结合，才能成为适用的速记方式。切合汉语实际的速记方式当然便是民族化的方式。任何一国的速记方式都具有其民族化的特性。这不决定于速记符号的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式，而是决定于速记符号所表现的该民族语言的特征。当然，速记的民族形式除了符合民族语言特点外，也要顾及民族文字的书写习惯。忽视民族文字书写习惯的速记方式，不易养成对速记符号的“视觉习惯”与“条件反射”，很难普及推广。科学内容、大众方向、民族形式、应该是汉语速记创案原则。

（四）怎样看待作为拼音新文字设计的速记方案？

我国早期的速记方式，不论是沈学的《天下公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还是王炳耀的《拼音字谱》、力捷三的《闽腔快字》，都是作为拼音新文字方案设计的，都认为自己在创造新文字。

那么，这些方式，究竟算拼音新文字，还是算速记？

第一，从历史发展来看，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就是蔡璋的《中国速记学》的前身，设计的速记符号，基本相同。“快字”，就是快速书写法，就是速记。

第二，速记≠文字。从古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正式用速符作为文字的。为什么呢？文字是社会公认的书面交际手段，它必须约定俗成或由国家统一规定，才能通用。为了传远、留久，文字必须定型、明确、规范、易辨。因此作为法定、社会公开传递的工具，只能是文字。速记是快速书写的技术，为了快，符号极其简单，略法众多；简捷、灵活，只求便于快速书写并不要求统一方式、方法，所以不能作为正式的拼音新文字。

第三、在我国速记界，有人把速符设计成拼音新文字，近代有，现代也有，如 30 年代的汪怡， 40 年代的金长风；当代也有，如陈有章还在设计速符现代化汉字方案，直至 1987 年，四川学者李思元还把他的速记方案定名为《世界（汉语）线点文字》。其实，早期作为拼音新文字设计的《传音快字》、《天下公字》、《拼音新字》等等，就是速记，而不是文字。历史事实证明，凡用速记符号设计的种种拼音文字方案，都是速记方案，这

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五）怎样看待历史上我国手写速记的类型划分？

由于时代的局限，我国速记方式有许多提法，严格说来缺乏科学性。比如汪怡的音节直配式速记自称“一字一线式”速记，金长风的音节直配式速记自称为“一线一音式速记”。一线，单线条；带钩或带圈的应是复线不能算一线。这一点日本速记是严格区分单线和复线的。“一字一线”或“一线一音”，只有部分符号可以做到，大部分拼音符号是不可能做到的。

又如椭圆体系速记自称“流线”，似乎正圆体系是“非流线”的；其实，“流线”又称“轻线”，1888年葛锐格首创椭圆体系速记，因无符号粗细写法区别，书名《轻线记音学》；可见“轻线”、“流线”是针对粗细线而言；凡符号不分粗细，不论正圆体系、椭圆体系、叶子体系，都可称为“流线”或“轻线”。又如，过去把几何式速记仅指正圆体系而言，这也是不科学的，椭圆、叶子、正圆均是几何图形，均属几何式速记。

我国速记从音符配制上严格说来只有声韵拼音式和音节直配式两类。音节直接配置传统上自称为一线一音式速记，其实带圈的符号是复线，只有单线才可称“一线一音”。

传统上把叶子形速记归入正圆式速记中，这不科学。因为叶子形更接近椭圆形但又不等同于椭圆形；因此，理应与正圆、椭圆鼎足并立。颜廷超说“叶子形就是椭圆形”。叶子形虽接近椭圆形，但仍有区别。叶子形速记，是中国的独创，是民族的骄傲。沈学、汪怡、长风速记都是叶子形速记，它并不同于正圆形，也不等同于椭圆形速记，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汉语速记方式。

五、中国速记发展的特点

中国速记的发展是，先正圆式、叶子式（1896），继而椭圆式（1935）进而出现草书式（1952），再而出现综合型（1978）。

这是中国手写速记的发展过程。到 1964 年陈越发表《ABC 简易速记法》，开始向速记机械化转变，字母式速记登场。字母式的产生是手写速记向打字机速记，进而又向电脑输入速记发展。到 1994 年唐亚伟发明了“亚伟中文速录机”，加快了中国速记现代化。

中国速记发展的过程，在世界速记百花园中大放异彩，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奇观。迄今中国各种体系都在发展推广，出现了共存共荣的局面，这是各速记先进国家中所没有的。在英国是皮特曼的一统天下，在美国是葛锐格的一统天下，在日本是正圆式的一统天下，在德国、俄国是斜体派的国家统一速记，都排斥其他方式形成惟我独尊的局面。所以说中国速记百年史是内涵极其丰富的百花齐放的速记学术发展史。

中国速记已有百年的历史。创造了许多光辉的业绩。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中国近代史与当代史的侧面。说明中国速记的发展是与政治的变革分不开的。今天我国的建设正向现代化发展，所以速记实现现代化是中国速记发展的必然趋势。

纵观中国速记发展过程是由几何派正圆式起步，进而叶子式、椭圆式登台，到建国以后苏联草书派速记传来，兴起斜体式创研的热潮。经过十年动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入速记复兴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电脑的推广，电脑速记也应运而生，电脑速记软盘、汉卡及亚伟中文速录机相继问世，使中国速记进入世界速记行列。

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速记走向世界的形势日渐扩展。1986 年以唐亚伟为团长的中国速记友好访日代表团一行四人（唐亚伟、颜廷超、陈荣滨、高铮）访问日本的东京、大阪、奈良，与日本速记友人交流速记文化。 1986 年中国庆祝速记九十周年之际，日本以川口晃玉为团长的日本速记友好访中代表团访问北京，参加了庆祝大会，进行了学术交流。 1994 年以唐亚伟

为团长一行五人参加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 40 届国际速记打字联合会的年会，并接纳中国为正式会员国， 1995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第 41 届国际速记打字联合会年会，中国又派出以章岩为团长的 14 人代表团参加大会，这说明中国速记正式走向世界。

第一编　速记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章　启蒙时期的中国速记（1896～1911）

第一节　概述

我国汉语速记，是从1896年开始的，是作为文字改革方案提出的。维新变法，一些爱国人士认为“救国之道在于唤起民众，方法是改革汉字，普及教育，以利于平民”。

这一时期，速记创案者，把速记称为“快字”，是作为拼音新文字而传播的，是以全民为对象的。这时期的速记方案，除沈学是叶子体系外，都是正圆体系，声韵双拼音方式。如：

《天下公字》沈　学著　　1895年发表
《盛世元音》沈　学著　　1896年出版
《传音快字》蔡锡勇著　　1896年出版
《闽腔快字》力捷三著　　1896年出版
《拼音字谱》王炳耀著　　1897年出版
《拼音新字》沈　学著　　1900年出版
《传音快字》张文龄著　　1908年出版
《速记法》郗志坚（译音）著　1910年出版
《中国新字速记法》林子峰著　1911年出版

其中1896年是汉语速记创立的一年，不但同时出版三种速

记著作，而且开始了以蔡式速记为主的新时代。

第二节　蔡锡勇与《传音快字》

在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两年，以速记符号为拼音字母的切音新字先后出现了以下四种方式：

蔡锡勇的《传音快字》　　1896年出版

沈学的《盛世元音》　　1896年出版

力捷三的《闽腔快字》　　1896年出版

王炳耀的《拼音字谱》　　1897年出版

速记界都把1896年算做中国速记的第一年，是中国速记史的纪元元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速记的启蒙时期，《传音快字》还未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尚未发挥速记的作用；但却为中国速记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真正使切音新字演变成速记，并使之发展下去，其功劳在蔡璋，他是蔡锡勇的儿子，所以中国速记之鼻祖应当是蔡氏父子。

蔡锡勇在中国文化史上，除发明了速记雏形《传音快字》，而且把西方的复式会计科学介绍到中国，促使会计制度进行改革。他在洋务活动中对中国的产业开发做出了贡献。他还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一生是创业的一生，他的业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我们速记界引为自豪。

一、蔡锡勇生平

蔡锡勇（1847～1898）字毅若，福建龙溪（今龙海市）人。蔡的先世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估计很可能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